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利玛窦中国札记

何高济 王遵仲 李 申 译 何兆武 校

341
0421
123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利玛窦中国札记

上册

利玛窦 金尼阁著

何高济 王遵仲 李 申 译

何 兆 武 校

中 华 书 局

1983年·北京



图1. 利玛窦像 (游文辉绘, 1610年)



图2. 利玛窦和徐光启像
〔十七世纪的一幅铜影版画，藏于贝特曼
档案馆 (Bettmann Archives)〕



图3.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本封面(16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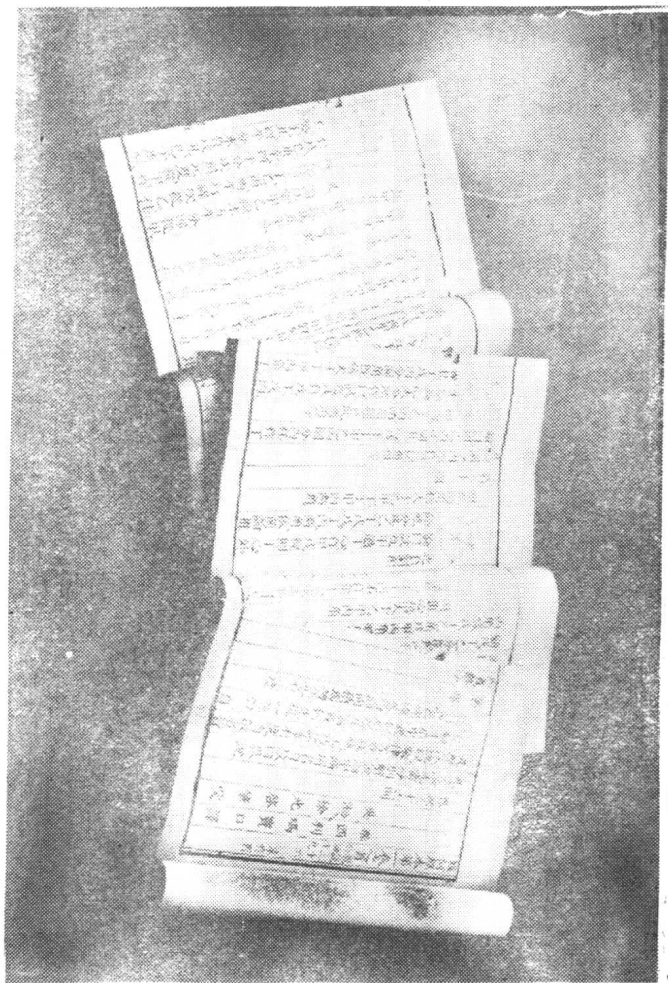


图4. 《几何原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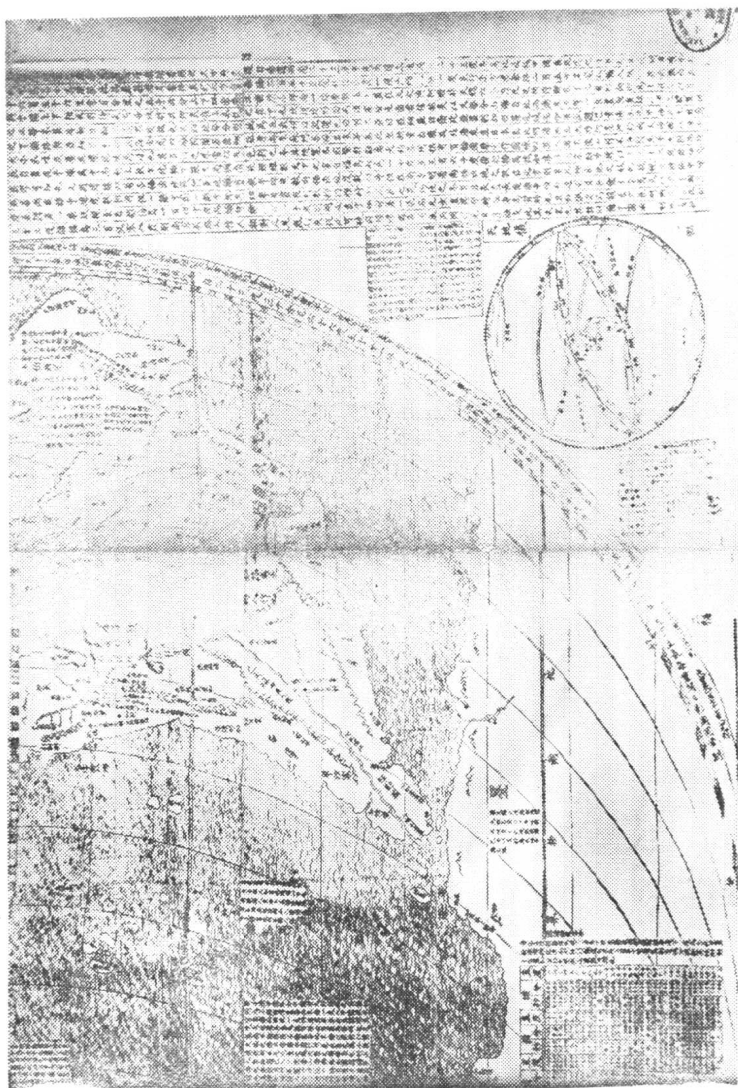


图5. 《坤輿万国全图》(部分)
(选自禹贡学会刊本)

中译者序言

利玛窦(Mathew Ricci)这个名字在中国是并不陌生的。历史上到中国来的欧洲人中间,也许马可波罗和利玛窦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名字了。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外界的大规模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作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这个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于发展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性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的。

利玛窦于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意大利的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马塞拉塔(Macerata)城,于1561年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他在十六岁时奉父命到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继续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家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学习天算。后来他自愿到远东传教。1577年利玛窦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在葡萄牙候船期间,他曾在高因盘利(Coimbra)大学学习;这所大学由葡萄牙国王若望第三和耶稣会创立人依纳爵联合建立,代表着海外殖民势力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势力的结合,它是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一个学术中心,后来耶稣会在中国的一些重要译书,就是这个大学的教本。1578年3月24日,他从里斯本乘船往东

方,于同年9月13日到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留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派他随赴中国的传教团到中国来传教。1582年4月他自果阿启行,同年8月抵达澳门;从此,他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从澳门和肇庆到韶州、南昌和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他在1610年5月11日死于北京,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

在晚年的时候,他感到余日无多,便开始把他在中国传教的经历撰写下来。到他死时,这份记录已告完成,仅留下一些空白以待后来补充。这个记录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利玛窦札记》(或称笔记、纪行、手稿、日记、记录、记事)这一著名历史文献的由来。手稿是用利玛窦的本国语言意大利语写成的。封面上除了有“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作其他说明,看来他并不一定要想把它公开刊行。据金尼阁说,利玛窦写这份文献,是打算先把它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再让别人阅读;其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使同会教友及有关人士从中获得教益。

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附有利玛窦死后荣哀的记述。这个拉丁文本第一版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它的封面题字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会务记录五卷 致教皇保罗第五 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 著者同会比利时人尼古拉·金尼

阁。”封面上所谓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实即指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的高潮之后，西方殖民国家大举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他们把赴中国的传教也视为一次远征或探险(expedition)。

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刊行后，在欧洲不脛而走。根据原本本所翻译的各种文字译本陆续出现；计有拉丁文本四种，法文本三种，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意大利文本各一种。1625年《普察斯朝圣者丛书》(Purchas His Pilgrims)中收有一个英文摘译本。但完整的英文本是直至1942年始由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译出，书名为《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1978年还出版了贝西尔(George Bessiere)译的一个法文新译本。

利玛窦的原意大利文手稿并没有遗失，而是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里发现了。当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或译王都立，或译文读礼)神父把它连同利玛窦的其他书稿一起刊布，题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 P. Matteo Ricci)。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本书原稿，题名为《中国报导》(I Commentarj della Cina)；下卷为利玛窦的书信。1942年，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神父再把它收进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i)中。这部《全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刊行于1942年和1949年，第三卷则是对全书的注释和索引。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利玛窦的最重要的文献。

原意大利文稿的公布，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起一些讨论。有的学者比较了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本，认为拉丁文本

除明显的增补而外，还有些不大显眼的修订和有系统地进行过改动的痕迹。研究这些不同之处，可能有助于说明金尼阁采用了哪些新材料，以及他的看法在哪些方面和利玛窦有所歧异。但是就全书来说，正如金尼阁本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真正作者仍然是利玛窦。至于金尼阁所增修的地方，有的是他本人的见闻，另一些则得自可靠的来源。作为一个和利玛窦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关于金尼阁本和利玛窦意大利原文本异同之评论，可参见本书附录《1978年法文版序言》第一节《〈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拉丁文本及原意大利文本》。

很久以前，我国的学者即已知道此书的存在，并且通过翻译的介绍而得知它的部分内容，但一直未能看到原书和它的完整的中译文。

陈垣在《涇阳王徵传》（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980年中华书局版）中曾介绍金尼阁如下：“金尼阁者，比利时人，利玛窦卒年（按即1610年——引者）至中国，曾集利玛窦笔记为蜡顶文中国开教史。”这里所谓的“蜡顶文中国开教史”，即指这部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张星烺在叙述利玛窦的同时代人、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笃（Benedict de Goes）来华经过时，曾根据英国学者玉尔（Henry Yule）的英译文，把这部书第五卷内的有关部分译为中文，收入他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1930年辅仁大学版）。他把此书的书名译作《支那传教录》或《耶稣会支那传教录》，并对这部书的内容作了这样的介绍：“一千九百十年（清宣统二年），为利玛窦卒后三百年之期。义大利人追念其传教

功勋,在其原籍马塞拉塔城举行典礼以荣之。利氏族中,仍藏有利玛窦自写之《纪事书》(按即本书——引者)原稿。神父文图理(按即汾屠立——引者)刊印之。法国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引者)尝将此本与金尼阁书互校,仅略有谬误而已。”

冯承钧翻译和介绍过许多有关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著作,如费赖之(Aloys Pfister)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等书。他译的裴化行(Henri Bernard)的《欧洲著作之汉文译本》中,把这部利玛窦札记译为《记录》,并转述裴化行的介绍说:“利氏之记录曾经金尼阁神甫译为拉丁文……其意大利文本,自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以来,经文读礼(即汾屠立——引者)神甫整理,并加入不少信札注释,欲知传教初年之情形,此本仍不失为一种重要资源。”裴化行也提到德礼贤的新编本,“材料更为丰富,尤堪宝贵”。另外,冯承钧译伯希和(Pelliot)《艾田》一文(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1956年中华书局版),谈到伯希和对此书的评价说:“虽然记事的原文可以校订金尼阁的拉丁文本,不过此种记事皆在事后记录,必须取当时的确证如信札者来检讨,方可不致于发生误会云。”

还应该提到王昌社译的裴化行著《利玛窦和当代中国社会》。这部书主要即取材于这部《利玛窦札记》,不少地方甚至直接引用利玛窦的原话,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札记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但是《利玛窦和当代中国社会》毕竟是一部专著而不是札记的译文,因此和札记本身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其间取舍和详略各有不同,而叙述的角度和语气更有区别。对于研究者来说,裴化行的这部著述毕竟不能取代《利玛窦札记》的

原文。札记的第一卷是对明代当时社会所作的概述，这一卷自然不见于裴化行的书。在事实叙述方面，二者也有出入。例如，据原札记所载，耶稣会的神父们初到肇庆时和知府王泮关系很好，罗明坚和麦安东听从了他的劝告前往他的老家浙江绍兴，并且王泮的老父还领洗入教；但是王泮的家人“由于害怕拜访神父们的大批客人会带来麻烦，就伪造一封信，叫神父们返回他们在广州的同伴那里去”。罗明坚回到肇庆后，王泮的态度却大为改变，对神父们表示冷淡，甚至拒绝接见。裴化行的书没有提到这种关系的变化，而是把神父们的返回归因于“绍兴的儒士反对他们”。可见裴化行所依据的材料，和札记不尽相同。

《利玛窦札记》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研究明史，都是颇有史料价值的。它的记述的真实性在于，撰写者本人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而且熟悉中国生活的同时代的欧洲人。利玛窦在他的札记第一卷开宗明义便说明他的叙述和其他欧洲著者对中国的叙述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其他人则只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第二手材料。他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且游历过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因而这些人写中国，并不是作为目击者，而是只凭道听途说并有赖于别

人的可信性。”

中国和欧洲在古代和中世纪很少有直接交往，所以彼此也没有什么直接的知识。欧洲人自古以来虽然知道东方有个丝国，但完全不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它就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成吉思汗西征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道路。十三世纪以后，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开始陆续到中国来，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震动了欧洲，使欧洲人知道东方有一个强大的鞑靼君王，统治着一个土地广阔、民物繁庶的大国。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也来到中国，证实了这个大国的存在。这位旅行家对中国城市的繁荣惊叹不已，并曾在杭州遇到过一些来自威尼斯的商人。

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隔绝，无论是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的游记，还是欧洲传教士如蒙德高维诺(Montecorvino)等自中国写往欧洲的信函，都逐渐被欧洲人遗忘；他们笔下的那个国家渐渐成为了传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刺激了当时西欧一些国家极力寻求海外贸易并扩大其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明中叶孝宗弘治十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好望角东行到达印度洋，打开了从欧洲直航远东的道路。欧洲商人，首先是葡萄牙商人，沿这条路到达印度、马六甲，然后到达中国和日本。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他们有的曾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写下一些有关中国的著述，如巴洛斯(Barros)、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和品脱(Pinto)等人的作品，于是欧洲人又产生了对中国的兴趣。继之出现的有艾斯加兰蒂(Escalante)和门

多萨(Mendoza)专述中国的书。但是,前一类作者仅在中国南部作过短暂的停留,又不谙中国语言,所记述的远谈不上全面和深入,后一类作者则根本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只是转手掇拾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的叙述,甚至于一些传闻。因此这些撰述都不能和利玛窦札记的第一手材料相提并论。

札记的第一卷企图全面概述当时的中国。有关中国的名称、土地物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等,在这一卷中都有具体而细致的描写。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传教士们,主要是利玛窦本人,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不同的阶层。他们不但在一些城市居住和生活过多年,而且旅行过许多地方。利玛窦以他灵敏的感受和一个外国人的局外旁观的态度,把他的见闻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这部叙述就是一部很好的明代中国游记,它在史料上的价值和地位可以说颇类似于亚瑟·扬(Arthur Young)的《法兰西游记》(Travels in France)之记述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情况对于后人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史料价值和地位。

利玛窦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被称为丝绸之国的,正是他所到达的这个中国。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方济各会传教士都曾叙及东方大国 Cathay(震旦或契丹),但欧洲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中国北部的别名。直到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北京的四夷馆里曾和一些穆斯林相处,从后者的口里,他得知中国又叫做契丹,才第一次肯定了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或震旦乃是中国的别名,中国就是 Cathay,或 Khitai 或 Xathai。契丹原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契丹名字一直被